

大学之道与文化的换位阐释

——读《跨文化对话》第19辑

□ 周文彬

由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19辑,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大学之道的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换位阐释。

大学之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本辑的“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专栏突出而又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欧洲的大学沿革》一文引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说:“现代大学和中古大学不同,在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各别。中古把知识放在宗教的范畴中,现代则把知识放在科学的系统里;中古的生活原则是权威,现代的生活原则是自由。”而为了现代的自由原则,大学管理的传统倾向是自治;争取大学的自治,不惟是学术自由和独立的问题,也是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尊严的问题。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思想专制和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大学是每一代人获得自由的地方。当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提出的“无条件大学”观念,说明大学有质疑一切的权利,包括不受任何限制地发问。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纵观欧洲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自由虽与大学不同始,但求与大学同无终。《莫兰教育思想简论》一文介绍法国当代思想家莫兰的教育思想说,他认为现代性的历史表明,人类必须放弃单靠社会革命就可以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实质上就是社会的基本问题;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向学生的头脑填满知识,不如说是教育他们善于了解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掌握应付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本领并使其成为有资格的世界公民。《21世纪的大学》一文针对教条主义的偏颇,指出大学的首要职责不是教育学生如何适应未来社会——好像历史提前写好了一样,而是培养学生进入世界、创造世界、处理各种关系和进行必要变革的能力。《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一文讨论了“大学的理想”和“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期望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面貌,把大学的启蒙功能还给大学。《大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一文,盛赞哈佛大学乃至美国的教育是把学生当做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对象来培养,鼓励学生充分开发自己的各种潜力。同时指出中国在“五四”以后就将功能性的技能教育取代了人文伦常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再去突出“成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越来越商业化、金钱化,大学不少领导公然鼓吹学生去追逐名利,家长则成了把宝押在子女身上的长线投资者。该文认为,要改变中国教育的不良倾向,我们必须从“如何做人”这一问题开始予以深入地反省。

以上诸文无论是正面论述,还是批判反省,都在澄清和呼唤大学之道。这个道就是:真理与自由。所谓大学之道是真理,就是说,大学是知识的场所,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追求和捍卫真理。而自近代以来,由于专业化的需要,各种知识被片面化而相互隔离起来了;由于工具理性的偏颇,以价值理性见长的人文科学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受到轻视和排斥;由于民族国家的诉求,偏于一地一国的知识已经损害了人类整体的和谐和合作。所以,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主张开启整体性、模糊性的复杂性思维,要求强化学生的人文修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做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所谓大学之道是自由,就是说,大学是无禁区的研究和学习场所,大学人必须具备勇敢运用自由理性的人格。然而近代以来资本化的管理,限制了大学的独立而使大学商业化、科层化和官僚化了,所以当代教育改革重审大学的自治传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尽量免于当下将大学当做谋生和晋升手段的急功近利,要求政府保护大学的思想自由,使大学永远具有社会的启蒙功能。大学之道一方面是真埋,一方面自由,那么,这两者之中谁是主导呢?显然是自由高于真理。因为真理的探讨和维护有赖于自由理性的发挥,一旦离开了人格自由、思想自由,理性无法自由开启,又何来真理?所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大学之道是自由:自由的人格、自由的创造、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学术。

说到跨文化研究,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它逐渐出现了新的面貌。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的换位阐释。近代以来的跨文化研究,或者是西方人的以西释中,或者是中国人的以中释西,这都是站在西方思想立场上的文化研究,也就是所谓西方中心主义。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多,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危机逐步加深,东方文化日益显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于是,有的西方学者便离开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企图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上还原东方文化。而与此同时,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性影响的东方学者随着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特别是随着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不但离开了东方文化的立场,而且也离开了西方现代性的立场而企图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还原西方文化。这两者都是异域文化研究者的换位研究,即站在对方文化立场上的跨文化研究。

《从西方汉学反思中国学术》一文所介绍的西方当代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著《(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一书,就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换位阐释和研究的一例。在于连看

来,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西方哲学都是从希腊的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而无法真正建设性地开创未来。而要真正地摆脱希腊传统、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如果排除印欧语系,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参照。因为中国既不同于欧洲,也不与欧洲相像,它们在思想上的区别是:西方思想中规定语言追求普遍性,中国思想中的语言“指号”可以说是从普遍性来的。这样,“在前者,普遍性构成的是目的,而在后者,普遍性构成的是‘源泉’”,因此,西方的思想是“哲学”,中国的思想则是“智慧”。我们看到,正如作者所说,同黑格尔等人一样,于连看中国时手中也有一把西方的尺子,但他不用它来裁减中国思想,反而首先是还原中国的思想,再用中国的思想来检验西方。当然,他检验西方是为了回到西方、创新西方。

《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神学—政治导读》一文,则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换位阐释和研究的一例。不过这不是从中国文化换位到西方文化,而是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维度换位到西方文化更为根本和古老的神学—政治维度。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定义比富兰克林所谓“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要早两千多年。但是,19世纪以来,西方人只是从现代性的维度、更简单地说是从经济学维度阐释鲁滨孙这一艺术典型的,将其说成是资产者征服和掠夺世界市场的形象,中国学者对此学步了半个世纪。但是该文经过认真、仔细地分析文本,重新解读了“鲁滨孙的命题”:灵魂的拯救取决于神意的恩典,但是由于自然法则扼守的自然状态是人类推脱不掉的根本状态,它被克服的唯一可能性存在于政治安全与文明的建立这一全然人性的行动之中,所以灵魂的拯救就完全取决于这人性行动的首先完成。这意味着,政治安全与文明一天得不到永久确立,神意就一天不会发放它吝啬的恩典。

以上两种书、文在文化上的换位阐释和研究,在结论上未必精当,特别是“鲁滨孙”一文关于神是人的产物、没有第一哲学只有政治哲学的议论更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将神的超验性还原为人的经验性,实际上又回到了西方现代性和中国传统的无神论立场;它言下之意的所谓“第一哲学尤其是近现代的第一哲学企图以思辨的方式借鉴宗教哲学而化解宗教的努力是‘徒劳’之举”的看法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但是,它们的“换位”态度却是应当予以提倡的。虽说由于文化扎根于生活方式,完全的文化换位对于学者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如果跨文化研究不向这一方向迈进,所谓“跨文化”只是扩大自身文化而混灭他者文化罢了,跨文化也就成了“侵略”他者文化的代称。而跨文化研究的目的则是多元文化的还原、存留、对话和融合,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文化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多样化的文化得以创新,从而使我们这个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世界更加适合全人类的生存。